

研究論文

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的影響因素研究——基於個體特徵變數的考察

曾麗紅、吳雁

摘要

本文是15年來針對中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最大規模問卷調查研究的一部分，旨在了解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狀態及其影響因素。通過文獻梳理發現，既往的新聞從業者研究多從傳統的結構功能範式出發，忽略了對新聞從業者個體能動特徵的考察。本項研究突破傳統方法論的局限，採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旨在考察新聞從業者的個體特徵變數對其工作自主性的能動影響。本文的主要研究問題是：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認知的整體狀況如何？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從業者個體特徵變數中的媒介角色認知和互聯網使用技能是否可以預測其工作自主性？通過問卷調查和統計分析，本項研究發現：第一，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

曾麗紅，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博士生、邵陽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研究興趣：新媒體研究、政治傳播。電郵：ZLH0406@qq.com

吳雁，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博士生、廣東工業大學講師。研究興趣：新媒體研究。電郵：wuyan8160@163.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4年5月5日。論文接受日期：2015年5月12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4期(2015)

者對工作自主性的整體評價有所下降。第二，在控制人口變數的基礎上，新聞從業者個體特徵變數中的媒介角色認知和互聯網使用技能對其工作自主性均造成了顯著影響。

關鍵詞：工作自主性、新聞從業者、媒介角色認知、互聯網使用技能

Research Articl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Mainland Newspaper Journalists' Work Autonomy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 Study Based o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Lihong ZENG, Yan WU

Abstract

According to newspaper journalists in mainland China, this thesis is part of the largest survey research in the last 15 years. The thesis' aim is to investigate mainland newspaper journalists' work autonom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it is found that in 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journalists chose the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paradigm view and ignored the investigation of journalist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methodology and using quantitative study methods, this study is designed to explore how journalist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affect their work autonomy. The following are the main research problems of this study: What i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Chinese mainland newspaper journalists' work autonomy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Can the Chinese mainland newspaper journalists' cognition of

Lihong ZENG (Associate Professor). Chinese Department of Shaoyang University. (PhD. Student).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new media research, politics communication.

Wu YAN (Lecturer).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hD. Student). Art Research Institut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Research interest: new media research.

media role and skills of internet use predict journalists' work autonomy?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has two conclusions: First, there is a decline of mainland journalists' overall evaluation of work autonomy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second, on the basis of controlling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Chinese mainland newspaper journalists' cognition of the media's role and skills of internet use both have prominent impacts on their work autonomy.

Keywords: Work autonomy, journalists, cognition of the media's role, skills of internet use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Zeng, L., & Wu, Y. (2015).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mainland newspaper journalists' work autonomy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 study based o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4, 19–55.

鳴謝

本文系中山大學百人計劃引進人才項目「新媒體環境下的新聞從業者」(項目編號：17000-3281301)的系列成果之一。感謝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張志安教授提供的數據支持，感謝匿名評審提供的寶貴修改意見。感謝博士生導師陳衛星教授的理論指導！

研究動機與目的

當下中國大陸正處於政治、經濟和技術環境變遷的重大轉型過程中，傳統報業面臨着政治控制、市場壓力、技術更新的多重考驗。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陸推行市場經濟自由化，但嚴格的國家控制方興未艾，報業機構要同時兼具扮演政黨喉舌和賺取市場利潤「一僕二主」(潘忠黨等，2008：17-48)的身份與角色。在經濟市場化的過程中，中國大陸報業組織已經從傳統的國家壟斷結構轉變為分散化、多樣化、多層級的「蜂窩狀」結構。有大陸學者將市場化後中國傳媒的種種變化歸結為國家政治威權與市場經濟相互滲入的結果(劉兢，2010)，然而學者周翼虎(2009)卻指出，在中國大陸新聞業市場化的背後，始終存在着國家一元獨大的政治權力運作。媒介的經濟自由並不必然帶來政治自由。在國家權力的政治經濟雙重操作下，新聞業的市場化生存其實類似於「籠中鳥」。

儘管學者們對導致大陸傳媒結構分化的歸因說法持有爭議，然而無論如何，市場化的衝擊畢竟打破了大陸報紙媒體板結固化的壟斷模式，並進一步加速了其產業化進程。大陸報業對政府的依賴程度日益降低，經濟領域自由化的影響逐漸滲透到政治領域，媒介多樣化不斷溢出原有的體制邊界，報業結構的多樣性進一步增加了國家控制的困難。新世紀以來，大陸的政經關係更加充滿了矛盾與衝突，從而使得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價值定位、角色認知和工作旨趣變得日益多元化、曖昧化和模糊不清。大陸報業新聞人既是傳統政經體制的維護者(傳統黨報體系)，也是傳統政經體制的顛覆者(新興都市報體系)。為了滿足政黨和市場體系的雙重需求，報業新聞人經常承受着緊張與挫折，從他們弔詭的專業實踐上我們大致可以看到大陸政經結構變化的一鱗半爪，這些變化均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大陸報業新聞人的專業生產和實踐活動，並使得他們的職業理念和自主精神亦呈現出紛繁複雜的風格和面貌。

與此同時，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也在衝擊着大陸報業的生產機制和傳播結構，迫使傳統報業組織不斷採納新的技術以適應全球化的挑戰。據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CNNIC)2014年第34次統計報告顯示，截至

2014年6月底，中國線民規模達到6.32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6.90%。目前中國網站總數為273萬個，CN下網站數為127萬個。各項指標均在顯示，中國已全面進入了互聯網時代，技術環境的變化自然而然地帶來了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生態和互聯網使用行為的變化。在互聯網興起之初，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大多使用它來搜集資料和尋找線索。但隨着資訊技術的不斷發展，被運用在新聞生產過程中的技能使用方式更加多元化。比如利用搜尋引擎來查找與報導相關的背景資料，利用QQ、Email等通訊工具進行線上採訪或擴大人際網路，利用BBS、博客、微博、社交媒體尋找新聞線索、推廣報導、與受眾互動等。毋庸置疑，當下新媒體技術已經浸淫到大陸報業新聞生產實踐的各個環節當中，對報業新聞人的專業生產和自主實踐產生了全方位的影響。

工作自主性是工作給予個人在安排工作、決定工作方式上的自由、獨立性和裁量權的程度，它是工作的五個核心特徵之一(Hackman & Oldham, 1976)。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則是指新聞工作給予新聞從業者個人在安排工作、決定工作方式上的自由、獨立性和裁量權的程度，它是衡量新聞從業者個體職業狀態和集體工作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既可能影響到新聞從業者的工作績效，也可能影響到新聞從業者的職業成功和組織目標的有效實現(范皚皚、丁小浩，2008)。對於大陸報業組織來說，工作自主性不僅是從業者個體實踐新聞自由的必要條件，也是評估新聞從業者是否為專業人士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無論對於新聞從業者個體還是報業組織集體來說都非常重要。學術實踐上，工作自主性又是一個模稜兩可的概念，在傳統的理論中，它有時候被當作一種個體的特質，有時候又被看作是集體的特徵，在不同的理論語境下研究者通常會賦予這個概念以不同層面和不同維度的內涵。然而「在世界主義哲學中，只有個體自主性具有內化的價值，因為個體在本體論意義上是先於群體的」(伯恩斯坦、科爾曼，2011：50)。因此，在本文中，個體論的建構基礎對於本研究的理論架構和測量設計具有實際的理論內涵和指導意義。

顯然，在新媒體環境下，研究者亟待關注：作為一種外生性變數，技術環境將會如何在體制結構背景下給大陸報業新聞人帶來迭加或突變的影響？這些影響又將會以何種方式內化在新聞人的生產實踐

中並影響到他們的工作自主情狀？基於社會情境建構個體心理的視角，認知行為理論提出，人的行為是由個人整體生活形態塑造的，在這個過程中，認知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認知結構或圖式(schema)指導着人們的資訊加工過程，並改變着個體的行為(阿德勒，2010)。本研究認為，隨着技術環境的變化，新聞從業者個體的認知圖式也在發生着相應的變化，這些變化將會引導並調控着個體的資訊處理模式和資訊加工行為，並以內生性的個體特徵變數的形式呈現出來。本文的研究假設是在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語境中，大陸傳媒體制中的政經結構是制約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發展的主要障礙。然而，當下的新媒體語境為大陸新聞業專業自主空間的開放創造了可能，使得從業者可以通過知識技能等策略性的生產實踐來突破政經結構的鉗制，從而為個體的自主性新聞生產開闢道路和空間。故此，我們希望本項研究達到兩個目的：第一，揭示出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認知的整體狀況；第二，在遞歸運用人口變數、個體特徵變數的基礎上，對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做出比較系統和全面的預測和解釋。總之，我們不但希冀能和過去的相關研究前後呼應，彼此對話，而且希望能夠增進我們對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狀況與影響因素之間多維生態的理解和把握。

文獻綜述

中外新聞從業者的相關研究

國外關於新聞從業者的研究，主要始於20世紀70年代。美國伊利諾大學的John W. C. Johnstone和Edward J. Slawski及William W. Bowman (1976)最早出版了有關新聞從業者的著作《新聞人員：美國新聞人員與他們工作的社會描繪》。20世紀80年代以後，這個領域的研究則以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教授David H. Weaver為代表，他在1980年代、1990年代分別對全美新聞從業者的職業意識、工作滿意度、工作自主性等進行研究，出版了《美國新聞工作者和他們的工作》(Weaver & Wilhoit, 1986, 1996)。此外，他還在1990年代中期召集全球數十位新聞學者

合力撰寫出版了《全球新聞人員：世界各地的新聞工作者》(Weaver, 1998)。在新世紀，學者David H. Weaver和Lars Willnat (2012)再次聯合全球新聞學者編撰了《21世紀的全球新聞從業者》，這些學術著作基本上總結出了全球新聞從業者的基本特徵。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華人學者也開始關注新聞從業者的研究，其中，尤以台灣學者羅文輝、香港學者陳韜文(2004)為代表，他們合作出版了《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第一次針對華人地區新聞從業者的媒介角色、職業倫理等進行了系統研究和深入比較。在此項研究中，華人學者不僅系統吸收了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還重點考察了華人地區特殊社會情境對新聞從業者的影響，揭示出兩岸三地新聞從業者的主要差異。1997年，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和全國記協對中國大陸新聞工作者進行抽樣調查，發現新聞從業者在自我感受中，其社會地位僅次於醫生，「以促進社會改革為己任」成為我國新聞工作者在職業價值方面的基本追求。張洪忠、蘇林森(2012)在轉型時期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中國新聞從業者在政治和市場體系的雙重制約下面臨着專業理想和現實困難的壓力，超過一半的從業者認為工作中最大的問題來自於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與此同時，一批大陸新聞傳播學者陸續跟進研究新聞從業者群體(陸曄，2000，2003；羅以澄、侯迎忠，2006；吳飛、白林，2006；張洪忠、何豔、許航，2007；張志安、陶建傑，2010；張志安、陶建傑，2011；張志安、張京京、林功成，2014；張志安、吳濤，2014)。

中外新聞從業者的媒介角色認知研究

Cohen (1963) 在研究華盛頓外交記者時，最早開始進行新聞從業者的職業角色研究。20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學者開始利用問卷調查法對新聞從業者的職業認知進行實證研究，根據調查結果，他們將新聞從業者的職業角色觀主要歸納為「中立」(neutral)和「參與」(participant)兩種(Johnstone, Slawski, & Bowman, 1976)。繼此之後，Culbertson (1983)把美國新聞從業者對媒介角色的認知分成三種：「傳統」(traditional)、「解釋」(interpretative)及「活躍者」(activist)。Weaver和Wilhoit在1982

年和1992年的兩次調查研究中，總結提出新聞從業者主要有傳播者 (disseminator role)、解釋者 (interpretative role) 和對立者 (adversary role) 三種媒介角色認知。到了20世紀90年代，Weaver和Wilhoit等又提出了「公眾鼓吹者」(populist mobilizer) 這樣一種新的媒介角色認知。以上大致歸納了20世紀美國新聞從業者媒介角色認知研究的基本情況。

然而，不同的社會制度、文化環境和行業狀況會導致新聞從業者媒介角色認知的差異。陸曄、潘忠黨(2002：39-53)指出中國記者新聞專業主義話語的建構主要來自於三類傳統：「文人論政」傳統、「耳目喉舌」傳統和商業媒體傳統，這三類傳統大體勾勒出中國新聞從業者媒介角色認知的三種類型：啟蒙者、宣傳者和記錄者。陸曄、俞衛東(2003)針對上海地區新聞從業者的調查發現，從業者普遍認為「提供新資訊」、「報導新事實」和「實行輿論監督」是媒體最重要的社會功能。李金銓(2004)研究發現：現代中國傳媒業的主要功能是啟蒙和宣傳，而非提供資訊，因此，中國大陸的記者角色主要可分為三種：儒家模式、毛澤東模式和市場化模式。周裕瓊(2008：90-96)針對全國範圍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媒體的社會功能中，從業者認為最重要的是「迅速準確地報導國內外新聞」、「對老百姓所關注的社會話題提供分析和闡釋」、「揭露和批評社會不良現象」和「對黨政機關的公務員進行監督」等四項功能。張洪忠、蘇林森(2012)研究發現，中國新聞從業者的角色認知中，最重要的依次為：「雇傭勞動者」、「養家糊口者」、「政黨喉舌」及「資訊發佈者」，這種角色強調反映了媒介市場和政治的雙重功能。張志安、吳濤(2014：61-75)發現，當下中國新聞從業者更加看重「提供資訊」的媒介角色，更加偏向於獨立、客觀地報導事實。新聞從業者對傳統的宣傳「喉舌」角色、輿論「監督」角色的重要性評價明顯下降，其新聞專業主義理念更加鮮明。

中外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認知研究

在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認知方面，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新聞界情況有很大差別。Weaver與Wilhoit(1986)研究發現，20世紀80年代美國記者享有很高的工作自主性。然而到了90年代，無論是在新聞題

材還是在報導重點的選取方面，美國新聞人員均感到自主性下降了(Weaver & Wilhoit, 1996)。南韓新聞人員覺得在選取和發表新聞時，自己享有合理的自主性。約五分之一的記者認為自己享有絕對自由(Auh, Lee, & Kang, 1998)，儘管新聞專業主義理念一直被他們所珍視(Lee & Kim, 2006)，然而到了新世紀以來這種觀念卻動搖了。芬蘭新聞從業者表示他們享有不錯的工作自主性，八成人表示他們可以自由地選取採寫題材，大部分表示未曾感到來自雇主或外間團體的壓力(Heinonen, 1998)。匈牙利新聞人員認為他們在選取新聞題材的自主性比提供解釋評論的自主性要高。近半的新聞人員覺得他們的工作自主性很高，三成人則認為頗高(Kovats, 1998)。在印尼新聞界，專業主義理念正在提升，大多數新聞人員認為他們擁有相當高的工作自主性(Hanitzsch & Dedy, 2012)。澳大利亞新聞人員認為他們的媒介組織表現很好，大多數新聞人員滿意於雇主所給予的工作自主程度(Josephi & Richards, 2012)。巴西新聞人員認為，薪酬和工作自主性是影響工作滿足感的兩個最重要因素，在工作中他們僅擁有一定的自主性(Herscovitz & Cardoso, 1998)。在阿爾及利亞，新聞人員面對組織和官僚限制，在新聞選取和消息來源選擇上不能有太多自主權。三成半的新聞人員說他們擁有很多自由，三分之一說擁有一些自由，只有少數記者享有完全的工作自主權(Kirat, 1998)。

在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地區，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性的認知差異比較接近。華英惠(1992)針對台灣地區報紙從業者的調查顯示，台灣多數報社記者認為自己在選擇報導題材及決定採訪對象方面，擁有充分的自主性。在台灣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有6%的新聞人員認為自己享有幾乎絕對的自由，認為享有很多及一些自由者分別佔41%及44%(Lo, 1998)。在香港，學者發現新聞人員的自主程度與整個社會的政治氣候有關，香港新聞從業者普遍把自己的職業理解成為一個免受政治和經濟壓力的自主職業(Chan & Lee, 2007; Chan, Lee, & Lee, 1996, 1998)。新世紀以來，羅文輝、陳韜文(2004)等研究發現，大陸、香港、台灣三地新聞人員均對工作自主性感到滿意，且滿意程度十分接近。而之前華人學者針對中國大陸新聞人員的另一項綜合調查顯示，只有極少數(8%)的人認為自己享有很高程度的工作自主權，有37%的

人不認為自己擁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權(Chen, Zhu, & Wu, 1998)。陸曄、俞衛東(2003)針對上海地區新聞從業者的一項調查顯示，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的整體認知在「一般」和「較滿意」之間。吳飛(2005)針對杭州市新聞從業者的調查顯示，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滿意度評價在「一般」和「較高」之間。

中外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的影響因素研究

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影響因素的研究大致可以被歸納為以下幾個範疇：

I、人口統計學因素

既往研究顯示，性別、政治派別、收入水準和職務層級等人口統計學的個體因素與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顯著相關。國外的早期研究證明，女性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更高。此外，在政治派別方面，越是持有政治保守立場的新聞從業者，其工作自主性就越高(Weaver & Wilhoit, 1996)。在收入水準方面，研究者發現，薪資越高，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就越高，新聞從業者的收入水準與工作自主性顯著正相關(吳飛，2005；Weaver & Wilhoit, 1996)。在職務層級方面，研究者發現，職位較低的新聞從業者享有的自主權也較低(Chen, Zhu, & Wu, 1998)。新聞從業者的職務級別越高，其工作自主性水準就越高，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與職務級別顯著正相關(吳飛，2005)。

II、政經因素

既往研究顯示，政府部門的宣傳管理及媒介的自我審查對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造成顯著影響。在美國，Weaver與Wilhoit(1996)發現，新聞人員的工作自主性受到了來自外部政府的限制。在西班牙，新聞從業者表示最大的外部限制可能來自於政府檔案不公開等(Canel & Pique, 1998)。在回歸之前的香港，新聞界瀰漫着一股憂慮氣氛，擔心政治主權的轉變將帶來新聞業的「自我審查」，從而影響到新聞從業

者的工作自主性(Chan, Lee, & Lee, 1996, 1998)。在馬來西亞，新聞從業者敏銳地感覺到他們的工作自主性是受到限制的，他們感覺自己或多或少成為了政府或政治官僚的「供玩耍用的小狗」(Lapdogs) (Ezhar, Sony, & Manimaran, 2012)。在中國大陸，學者們研究發現，宣傳管理與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顯著負相關(陸曄，2004)；新聞生產的自我審查支援度與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顯著負相關，在政府網站中，工作自主性越高的人，越不傾向於支持自我審查(張志安、陶建傑，2011)。既有研究還顯示，廣告收入、受眾興趣、媒介競爭、消息來源等對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也構成了顯著影響。Weaver與Wilhoit (1996)發現，美國新聞人員的工作自主性主要受到了來自廣告商和公眾的限制。南韓新聞人員卻表示，他們受到新聞來源和廣告商的壓力很小(Auh, Lee, & Kang, 1998)。西班牙新聞從業者認為，他們受到最大的外部限制是追逐受眾的興趣(Canel & Pique, 1998)。中國大陸學者研究發現，新聞生產的消息來源與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顯著正相關(陸曄，2004)。

III、機構因素

既往研究顯示，機構規模、媒介類型及媒介主管等對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影響顯著。Weaver與Wilhoit (1996)研究發現，媒體機構規模越小，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就越高。此外，在電台和週報工作的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較高，在雜誌工作的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較低。Bowers (1967)發現報業發行人因本身興趣及背景，對組織中的新聞部門特別關愛。當事件發生地點越近或新聞越具爭議性時，發行人會對新聞報導干擾越多。Sigelman (1973)認為記者上司不僅可以決定該報導哪則新聞，而且會影響新聞報導的觀點，甚至會刪改新聞。南韓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新聞人員的工作自主程度通常被下列因素所干擾：部門主管、編輯部主管和機構最高管理層(Auh, Lee, & Kang, 1998)。芬蘭新聞人員則表示，來自老總的政策和上級主管都可能對他們的工作自主性造成影響(Heinonen, 1998)。中國大陸學者研究發現，業務主管對新聞從業者的工作如確定選題、採制過程和發稿環節的影響最大(陸曄，2004)。印尼新聞從業者認為，他們的工作更多

地受到專業、程式和機構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的影響超過了政治和經濟力量的影響(Thomas & Dedy, 2012)。

媒介社會學視域下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影響因素的研究 進路

若立基於個體建構的方法論視角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重新觀照，我們會發現，既往的相關研究一直沒有脫離傳統結構功能範式的窠臼，倚重對政治、經濟和機構等結構性因素的考察，而對於研究場域中的「行動主體」——新聞從業者的個體能動特徵一直重視不足。即便有研究能將人口統計學的個體因素納入到整體考察的範疇(如性別、年齡、收入、職務、專業、學歷、背景等)，但這些人口統計學特徵也僅僅只能作為附加意義而存在，不具備任何獨立的解釋意涵。因此，在結構功能主義面向下浮現出來的新聞從業者始終是一群被結構的「行動者」，他們的工作自主性特徵拘囿於傳統結構和體制的束縛，相應之下由「行動者」的個體能動意識和主體選擇特徵所帶來的自主突破潛能卻被無意識地忽略和遮蔽了。為了突破結構功能主義方法論的局限，本研究決定另闢蹊徑，特將新聞從業者的個體特徵變數抽離出來進行單獨考量，以便更加深入地探尋新聞從業者的個體特徵變數(認知層面和行為層面)對其工作自主性的能動影響。

媒介社會學者認為，新聞具有雙重的本質，它既是一種社會產物，新聞內容反映了社會現實，又是一項組織性產物，是專業組織製造出來的成果。由於新聞具備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因此，在具體的生產實踐中，新聞從業者的工作會依賴一些編輯部內部或外部的資源，並受到它們的制約和影響(Bernard, 1994)。具體來說，新聞從業者的生產實踐一直處在三個層面因素的控制之中(張志安, 2008: 18):「(1)從業者自身的專業意識和職業理想，屬於個體(群體)層面；(2)編輯部內部常規的生產機制、報社的市場定位和利益訴求，屬於組織層面；(3)來自權力部門和宣傳部門的政治控制、商業機構的經濟控制等，屬於組織外部的社會層面。」媒介社會學的理论視域進一步凸顯了新聞從業者個體層面的能動特徵對其生產實踐和工作自主的塑造和

影響，這與本項研究個體方法論的突破形成契合，從而進一步為我們創新工作自主性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分類依據和行動指南。

在明確本項研究的理論視域和方法論進路的基礎上，我們再回望當下中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現實生存狀態。誠然，當下大陸報業正在承受着激烈的陣痛和劇烈的轉型，兩股力量沖蕩其中。一方面，政經體制的改革以及現代化、民主化的發展趨勢裹挾而來的時代潮流漸進地改變着大陸報業的結構模式和大陸報人的生存狀態；另一方面，當下的新媒體技術和資訊化語境對大陸報業的生產實踐造成了持續的衝擊，致使一批批資深優秀的報人在大浪淘沙之下紛紛投奔新媒體領域，縱使那些能留下來繼續堅守新聞理想和專業陣地的報業新聞人其專業理念和自主精神亦發生繁複的震盪和變化。互聯網的威力再次印證了技術與社會之間互為推手的基本關係。互聯網是一種新的技術，互聯網社會則體現了新技術的興起再一次改造了人類社會自身(李強，2015)。既然技術力量給大陸報業新聞人帶來了如此重大的影響，那麼，新媒體環境對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究竟有何影響？為了回應新媒體環境下我們對大陸報業新聞人職業生存狀況和專業發展境遇的現實關切，本研究提出了第一個問題：

RQ1：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認知的整體狀況如何？呈現出何種變化態勢？

結合前述的理論探討和文獻分析，本研究將既往研究中與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顯著相關的人口統計學因素列為控制變數，即控制住人口統計學中的性別、收入、職務和學歷(此次研究新增加學歷作為人口統計學控制變數，是因為考慮到個體的受教育程度與其媒介角色認知和互聯網使用技能顯著相關)等因素。此外，由於中國大陸長期執行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政黨政策，故本研究忽略人口統計學中的政治派別因素。

I、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從業者的媒介角色認知對工作自主性的影響

媒介社會學芝加哥學派把媒介作為社會的子系統來加以研究，「視媒介為社會整合和社會控制的重要方式之一，強調媒介與人、社會的

互動關係。其主要學術領袖之一派克 (Robert Park) 認為，傳播和交通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態環境，資訊傳播技術的廣泛發展改變了人的角色認知」(吳予敏，2007：303)。當下新媒體環境給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傳統工作和生產方式帶來了一股顛覆性的力量，新媒體技術通過改變新聞生產、傳播格局的方式悄然改變了大陸報業新聞人的職業生態、工作環境和角色認知。有研究發現，記者對於媒介在社會中扮演角色的看法對於其個人職業行為的影響要遠勝過於任何個人因素 (Zhu, 1997)。故有學者主張將媒介角色認知作為考察新聞從業者新聞專業主義的關鍵指標之一，並用以實證測量新聞專業主義的具體表現 (周裕瓊，2008)。由此可見，媒介角色認知既是研究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狀況也是研究其職業意識和自主程度的重要指標，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影響新聞從業者個體的職業理想和專業意識的方式來間接地調控着個體的工作自由程度，故本研究認為，媒介角色認知能夠成為一個較好地預測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的解釋變數。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了第二個研究問題：

RQ2：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從業者的媒介角色認知是否可以預測其工作自主性？

II、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從業者的互聯網使用技能對工作自主性的影響

20世紀30年代在北美萌芽，70年代發軔的媒介社會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分支——媒介環境學 (media ecology) 研究傳播媒介如何影響人的感知、感情、認識和價值，並重點研究傳播技術本質如何對社會結構產生深遠影響。「媒介環境學旨在研究文化、科技與人類傳播之間的互動共生關係，此外，還關心媒介形式的相互關係、媒介形式與社會力量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在社會、經濟、政治方面的表現」(林文剛，2007：16)。早期的媒介環境學者探討媒介技術對人和社會的影響，同樣忽略了人對媒介和社會的積極作用。事實上，媒介技術與技術使用者有一種互動關係，媒介技術對人和社會具有塑造作用，但是，被媒介技術塑造出來的人同樣也會有意識有目的地改造技術和社會。故此，大陸學者在反思互聯網技術與新聞從業者之間的關係後認為：技

術總會發生變革，而比技術更重要的是人，因為人的自主性和專業性更重要。人的自主性和專業性及其在媒介領域所做出的努力，決定了能否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中繼續推動中國社會和大眾傳媒的進步(張志安, 2012)。循此邏輯可以推演，由媒介技術衍生出來的媒介技術使用技能必將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媒介技術使用者的工作風貌和自主情狀。現實情境下，來自南韓的一項跨國研究顯示，隨着新技術在媒介領域的擴張，傳統媒體的新聞從業者被迫不斷地適應和改變——大多數南韓新聞人員使用網路來搜集資訊並與受眾保持聯繫(Kim, 2008)。一份同樣本的大陸調查研究也顯示，互聯網如今已經成為新聞從業者的重要輔助工具，它基本上貫穿了從發現線索、查找背景、新聞採訪和推廣報導等新聞生產的全過程(張志安、張京京、林功成, 2014)。毋庸置疑，互聯網所帶來的技術潛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傳統新聞人生產實踐的創新方式和自主空間。故本研究認為，互聯網使用技能或將成為一個較好地預測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的解釋變數。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了第三個研究問題：

MQ3：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從業者的互聯網使用技能是否可以預測其工作自主性？

研究設計

資料收集和研究方法

本文是針對中國大陸新聞從業者進行的問卷調查專案的一部分，該專案主要考察新媒體環境下中國新聞從業者的職業意識、新聞實踐及生存狀態。本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本次問卷調查主要採取非隨機抽樣的方法，於2012年11月至2013年3月間進行，選擇中國不同地理區域的5家報業集團(主報、子報及網站)或報社作為樣本，其中包括：四川日報報業集團、華商傳媒集團、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中國青年報。調查共發出問卷3,522份，共回收問卷2,203份，其中有效問卷2,109份，回收率為64.1%，有效回收率約為

59.9%。此次調查是自1997年喻國明在中國大陸進行大規模新聞從業者調查之後，15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中國大陸新聞從業者的問卷調查。接受本次調查的新聞從業者中：男性佔48.5%，女性佔51.5%。他們的年齡結構比較年輕，76.2%的在35歲及35歲以下，50歲以上的人僅佔2.4%，平均年齡在32歲(平均數=31.95)；絕大多數新聞從業者都擁有大專或大專以上學歷，83.3%的擁有大專或本科學歷，15.4%的擁有碩士、博士學位；主修新聞類專業的從業者達到37.6%，主修新聞以外的其他傳播相關學科的佔18.4%，主修新聞學以及另外一個學科(即輔修)的8.4%，35.6%的從業者沒有修讀過新聞課程。

本研究採用的調查問卷，主要是在參考美國學者維沃(Weaver)與威爾海特(Wilhoit)於1986年開展的研究以及港台學者羅文輝、陳韜文等人(2004)的調查問卷的基礎上，適度結合了中國大陸新聞業的具體情況略加修改而成。在本次調查問卷中，我們專設了一個測量「工作自主性」的綜合變數在分析中單獨使用，答案採用10級量表，1為非常有限，10為非常充分。此外，為了和大陸的新聞生產語境有效對接，本研究另從新聞選題和報導角度兩個維度切入來細緻考察新聞從業者在生產實踐層面上的自主程度。具體題項為，一：「你覺得在你的工作上，你個人有多大的自由來挑選報導題材(確定新聞選題)?」；二：「在決定報導新聞故事的側重點上(確定報導角度)，你有多大的自由?」答案採用5級量表，1為沒有自由，5為絕對自由。此外，在調查問卷中，我們採用了18個題項來考察新聞從業者媒介角色認知的問題，諮詢受訪者「以下所列各項，對你的工作而言有多重要」。答案採用5級量表，1為非常不重要，5為非常重要。另外，我們還採用了16個題項來考察新聞從業者互聯網使用技能的問題，諮詢受訪者「請問你是否使用以下互聯網工具或平台來幫助你的新聞報導工作」。答案採用4級量表，1為從不使用，2為很少使用，3為有時使用，4為經常使用。

變數描述與選取

本項研究的被解釋變數是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整體工作自主性、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其中整體工作自主性是被解

釋變數中的核心變數，它是指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在新聞生產實踐過程中的整體工作自主程度；新聞選題自主性是被解釋變數中的一個細分變數，它是指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針對不同新聞事實選擇不同新聞選題的自主程度；報導角度自主性也是被解釋變數中的一個細分變數，它是指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針對同一新聞事實選擇不同報導角度的自主程度。本項研究的解釋變數共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控制變數，其中包括學歷(1.初中或初中以下；2.高中；3.大專或本科；4.碩士；5.博士)、性別(1.男；2.女)、收入(1.5,000元以下；2.5,001-10,000元；3.10,001-150,000元；4.15,001元以上)、職務(1.總編輯；2.副總編/編委；3.採訪主任；4.部門主任；5.高級編輯；6.編輯；7.監製/編導；8.記者；9.實習生)四個人口變數；另一類是個體特徵變數，其中包括媒介角色認知和互聯網使用技能兩個原因變數，「媒介角色認知」是指新聞從業者對媒介在社會中應當承擔何種功能的看法，「互聯網使用技能」則是指新聞從業者的互聯網使用技術和能力。

計數與測量方法

本項研究的資料管理與分析採用社會統計軟體 spss 19.0。本研究依次選取並納入的變數有：(1)被解釋變數(整體工作自主性+新聞選題自主性+報導角度自主性)；(2)解釋變數(控制變數+個體特徵變數/媒介角色認知+個體特徵變數/互聯網使用技能)。本研究資料分析的基本步驟為：(1)對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的整體認知評價進行統計分析，在歷時性基礎上概括其變化態勢；(2)引入人口變數(學歷/性別/收入/職務)作為控制變數，然後依次引入個體特徵變數(媒介角色認知+互聯網使用技能)作為解釋變數對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進行綜合預測，揭示其預測力和影響程度；(3)在充分預測影響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顯著因素的基礎上，描摹出個體特徵變數與工作自主性之間的駁雜生態和有機聯繫。

研究發現

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性的整體評價

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性的總體評價如何？此次調查結果顯示，被訪者對自己在工作中獲得的總體工作自主程度評價一般，在十級量表上均值只有5.31（平均數= 5.31，標準差= 2.31）。而在此之前，港台學者羅文輝、陳韜文等在1996–1997年針對1,647名大陸新聞從業者所作的隨機抽樣調查顯示，大陸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性總體評價的均值為6.68（五級量表測量，均值係數乘以2）；大陸學者陸曄在2002–2003年針對全國八個城市1,401名大陸新聞從業者的隨機抽樣調查顯示，大陸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程度總體評價的均值為5.93（十級量表測量）。從歷時性的縱向邏輯來看，中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性的整體評價十幾年來略有下降的趨勢。

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從業者個體特徵變數對工作自主性的影響

在此次調查問卷設計中，我們採納了國外相關研究中測量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的量表模型，同時結合中國大陸報業新聞生產的實際情況，將新聞從業者在生產實踐層面上的工作自主程度指標具體化約為兩個細分變數——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經雙變數相關分析後發現，新聞從業者的新聞選題自主性與報導角度自主性之間呈顯著正相關（ $r = .69, p < .01$ ）；新聞從業者的新聞選題自主性與整體工作自主性之間呈顯著正相關（ $r = .12, p < .01$ ）；新聞從業者的報導角度自主性與整體工作自主性之間也呈顯出明顯的正相關關係（ $r = .12, p < .01$ ）。

本項研究對此次調查中所涉及到的18個媒介角色認知題項進行了降維分析，採用主成分分析法確定因數載荷（ $KMO = 0.86$ ，Bartlett's 球形檢驗 $\chi^2 = 9920.14, df = 153, p = .00$ ），結果顯示：新聞從業者的媒介角色認知題項大致呈現出四個因數，共可解釋61.46%的變異量。第一個因數包括「監察和檢視黨政領導人的行為」、「設置政治議程」、「監督

政府」、「監察和檢視商界的行為」、「推動人們參與政治活動」、「提倡社會變革」、「提供人們做政治決定需要的資訊」、「讓人們表達意見」和「影響大眾輿論」九個題項，我們將其命名為「監督與影響」因數，可解釋33.17%的變異量；第二個因數包括「為人們日常生活提供建議和指引」、「提供能吸引最多受眾的新聞報導」和「提供娛樂休閒」三個題項，合並成「服務與娛樂」因數，可解釋12.91%的變異量；第三個因數由「傳達政治領袖的正面形象」、「支持政府政策」和「支持國家發展」三個題項構成，合並成「宣傳與動員」因數，可解釋8.35%的變異量。第四個因數由三個題項構成，分別是「以事物本身的樣子進行報導」、「做一個置身事件之外的觀察者」和「對新聞時事做出分析」，合並成「提供資訊」因數，可解釋7.03%的變異量。因數分析結果顯示如下：

表一 媒介角色認知因數分析與歸類

	因數一 監督與影響	因數二 服務與娛樂	因數三 宣傳與動員	因數四 提供資訊
監察和檢視黨政領導人的行為	.83	.00	.06	.15
設置政治議程	.76	-.05	.18	-.02
監督政府	.74	-.03	-.15	.09
監察和檢視商界的行為	.73	.08	.11	.14
推動人們參與政治活動	.73	.21	.12	-.02
提倡社會變革	.72	.11	.01	.15
提供人們做政治決定需要的資訊	.67	.29	.16	-.01
讓人們表達意見	.57	.45	-.18	.18
影響大眾輿論	.51	.31	.24	.23
為人們日常生活提供建議和指引	.15	.82	.13	.09
提供能吸引最多受眾的新聞報導	.04	.81	.13	.15
提供娛樂休閒	.10	.63	.26	-.12
傳達政治領袖的正面形象	.10	.15	.90	-.04
支持政府政策	.02	.21	.89	.01
支持國家發展	.40	.22	.57	.31
以事物本身的樣子進行報導	.13	.14	-.05	.81
做一個置身事件之外的觀察者	.03	-.04	-.01	.76
對新聞時事做出分析	.40	.10	.22	.57

注：使用 eigenvalue =1 的標準，採用最大方差法 (varimax) 旋轉計算方式，運算出4個因數，累計解釋了61.46%的方差。

在當下新媒體語境中，互聯網使用技能已然成為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職業生產和專業發展的必需配置。那麼，為了更好地考察互聯網使用技能對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的多維影響，本研究對此次調查中涉及到的16個互聯網使用技能題項進行了降維分析，主成分因數分析後共浮現出三個因數(KMO=0.90，Bartlett's球形檢驗 $\chi^2=14961.96$ ， $df=120$ ， $p=.00$)，共可解釋62.06%的變異量。我們將第一個因數命名為「獲取資訊」，由「使用搜尋引擎來獲取跟報導相關的資料」、「使用網路資料庫來查找報導背景資料」、「使用網路論壇或博客來尋找新聞線索」、「使用社交網站來尋找新聞線索」和「使用從業者聊天群尋找新聞線索」五個題項構成，可解釋10.89%的變異量。將第二個因數命名為「互動推廣」，分別由「在論壇或博客轉貼、推廣自己的報導」、「在社交網站轉貼、推廣自己的報導」、「在網路上就自己的報導跟線民進行交流」、「使用社交網站來擴大人際網路」、「使用博客或微博來擴大人際網路」、「使用個人社交平台(微博、博客)來跟受眾互動」、「使用所在媒體提供的電子郵件或社交平台(微博、博客)與受眾互動」、「在網路上閱讀關於自己報導的評論」和「使用社交網站(或博客、推特)上一般受眾(非新聞同行)所提供的新聞素材」九個題項構成，可解釋44.35%的變異量。第三個因數命名為「網路翻牆」，由「翻牆在境外網站發佈報導相關資訊」和「翻牆流覽被禁網站的資訊」2個題項構成，可解釋6.82%的變異量(張志安、張京京、林功成，2014)。因數分析結果顯示如下：

表二 互聯網使用技能因數分析與歸類

	因數一 互動推廣	因數二 資訊獲取	因數二 資訊獲取
在社交網站轉帖，推廣自己的報導	.80	.13	.20
在論壇或博客轉帖，推廣自己的報導	.82	.13	.21
使用博客或微博來擴大人際網路	.72	.30	.05
使用社交網站來擴大人際網路	.74	.27	.16
在網路上閱讀關於自己報導的評論	.62	.34	.04
在網路上就自己的報導跟線民進行交流	.75	.14	.26
使用個人社交平台(微博、博客)來跟受眾進行互動	.71	.20	.26

	因數一 互動推廣	因數二 資訊獲取	因數二 資訊獲取
使用媒體提供的電子郵件或社交平台 (微博、博客)與受眾互動	.65	.13	.33
使用社交網站(博客、推特)上一般受眾所 提供的新聞素材	.57	.31	.44
使用網路論壇或博客來尋找新聞線索	.30	.69	.11
使用社交網站來尋找新聞線索	.43	.55	.21
使用從業者聊天群尋找新聞線索	.39	.55	.11
使用搜索引擎來獲取跟報導相關的數據	.12	.82	-.01
使用網路資料庫查找報導背景資料	.06	.77	.05
翻牆流覽被禁網站的資訊	.23	.12	.83
翻牆在境外網站發佈報導相關資訊	.23	.00	.87

注：使用 eigenvalue =1 的標準，採用最大方差法 (varimax) 旋轉計算方式，運算出3個因數，累計解釋了62.06%的方差。

為了進一步深入探究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個體特徵變數(媒介角色認知+互聯網使用技能)對工作自主性的綜合影響，本項研究在控制學歷、性別、收入、職務等人口變數的基礎上，分別以媒介角色認知的四個因數和互聯網使用技能的三個因數為自變量，以新聞從業者的整體工作自主性、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為因變量進行迴歸分析，統計結果顯示如下：

表三 新聞從業者個體特徵變數——工作自主性迴歸分析表

	整體工作自主性	新聞選題自主性	報導角度自主性
人口變數			
學歷	-.02	.06*	.06**
性別	-.01	-.02	-.03
收入	.11***	.12***	.13***
職務	.02	.04	.03
個體特徵變數			
媒介角色認知			
監督與影響	.10***	.03	.04
宣傳與動員	-.04	-.06*	-.06*

	整體工作自主性	新聞選題自主性	報導角度自主性
服務與娛樂	.01	.07*	.06*
提供資訊	.00	.05*	.08**
互聯網使用技能			
互動推廣	.07*	-.01	-.05
獲取資訊	.06*	.08**	.09**
網路翻牆	-.07*	-.10***	-.08**
F	6.55	7.64	9.73
Adjusted R ²	.03***	.04***	.05***

注：表格內的數位為迴歸標準係數beta，*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當下新媒體作為一種技術形態，其影響力主要體現在對人們觀念和意識的影響上，正如傳播學大師曼紐爾·卡斯特爾 (Maneul Castells) 指出，「縱觀歷史，資訊和傳播都是權力鬥爭，控制和社會變化的根本資源，因為社會中最基本的鬥爭就是發生在人們頭腦之中的鬥爭」(Maneul, 2007, pp. 238–266)。

迴歸模型顯示，在控制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個體特徵變數共變性影響的基礎上，新聞從業者的收入水準顯著預測了其整體工作自主性、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這說明新聞從業者的收入水準越高，那麼其對整體工作自主性、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的評價就越高。這一發現與國外研究成果相互印證，維沃與威爾海特研究發現，薪資越高，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就越高 (Weaver & Wilhoit, 1996)。一般說來，新聞從業者的收入水準越高，經濟條件越好，就越不會在新聞生產實踐中患得患失，或焦灼或迷失於各種政經關係中，而會更多地將關注的目光投放於自身的專業理想和職業精神層面。換言之，新聞從業者的經濟收入越寬裕，越不需要「為稻粱謀」或「為五鬥米而折腰」，那麼其在職業發展上就擁有更多的工作自主性。反之，其工作自主空間則越小。2014年震驚大陸新聞界的陳永洲和沈灝事件(均發生在南方報系)，就是兩個欲開闢財源最終卻觸犯法律紅線的報業新聞人為尋求經濟突破不惜鋌而走險的生動反例，其間也反襯了當下大陸報業在政治和市場雙重高壓以及新媒體擠佔環境下

行業紅利不斷消滅的囚徒困境。此外，在控制新聞從業者個體特徵變數的基礎上，新聞從業者的學歷也較顯著地預測了其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這說明如果新聞從業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知識面越廣，新媒體使用技術越嫻熟，那麼其越能夠在新聞選題和報導角度層面突破傳統結構和政經體制的拘囿，通過靈活運用知識技能層面的文化資本從而斬獲更多的工作自由。

迴歸模型顯示，在控制人口變數的基礎上，新聞從業者個體特徵變數的媒介角色認知中的「監督與影響」因數顯著正向預測了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整體工作自主性，「預測係數為 $\beta = .10^{***}$ 」。即在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媒介角色認知越傾向於去「監督與影響」時，其對工作自主性的評價就越高。這個研究發現得到了國內研究成果的部分支持，陸曄(2003)針對上海地區新聞從業者的調查研究發現，從業者「工作自主程度」的自我評價與對「輿論監督」的重要性評價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為 $r = .10^*$ 」。這兩個研究發現互相支持，互相補充，蘊含着雙重複雜的突破意涵：一方面，越傾向於踐行「監督和影響」的報業新聞人，越可能有改變現實的欲望和意願，因而其對工作自主性的評價就越高；另一方面，對工作自主性評價越高的新聞從業者，越傾向於去影響和監督社會，因而其對輿論監督功能的重要性評價也越高。此外，媒介角色認知中的「宣傳與動員」因數較為顯著地負向預測了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預測係數分別為 $\beta = -.06^*$ ， $\beta = -.06^*$ 」。這說明當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媒介角色認知越傾向於去「宣傳與動員」時，新聞從業者對新聞選題和報導角度自主性的評價就越低。當下「弘揚主旋律」、「解讀中國夢」、「講好中國故事」等官方威權的宣導性話語以及維穩方針指導下「多栽花、少栽刺」的各種宣傳管理策略，無疑都在昭示中國報業必須承載的意識形態功能和政治教化使命。研究發現也從側面映射了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依然深受宣傳體制的拘囿，「帶着鐐銬起舞」的生存狀態。再次，媒介角色認知中的「服務與娛樂」及「提供資訊」因數較為顯著地正向預測了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預測係數分別為 $\beta = .07^*$ ， $\beta = .06^*$ ， $\beta = .05^*$ ， $\beta = .08^{**}$ 」。即當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媒介角色認知越傾向於去

「服務與娛樂」及「提供資訊」時，其對新聞選題和報導角度自主性的評價就越高。這說明大陸報業新聞的市場化功能（提供資訊、服務與娛樂）突破了完全政治導向下的封閉生產空間，一定程度上給予了報業新聞人隱性抗爭和顯性突破的潛能，進而能夠為個體的自主性生產和專業性實踐開闢新的道路和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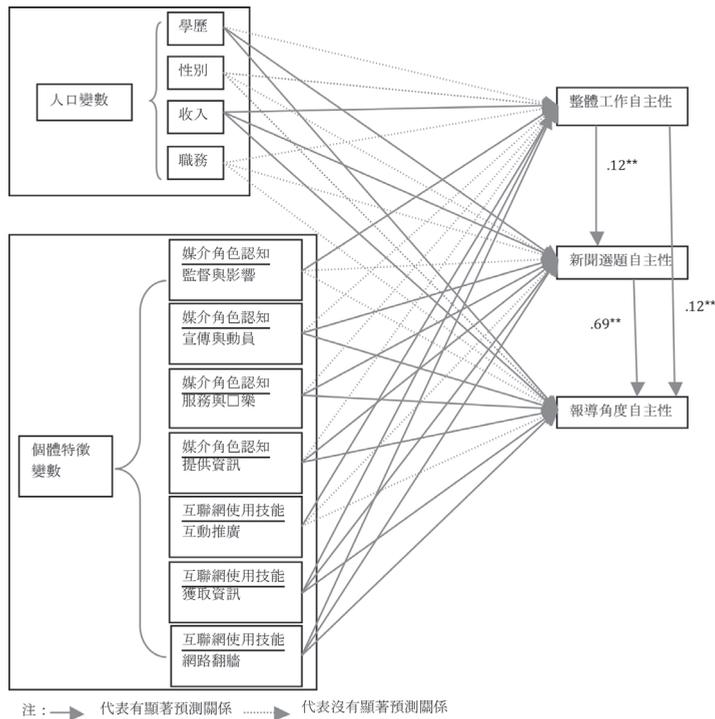
迴歸模型還顯示，在控制人口變數的基礎上，新聞從業者個體特徵變數的互聯網使用技能中的「互動推廣」因數較為顯著地正向預測了新聞從業者的整體工作自主性，「預測係數為 $\beta = .07^*$ 」。這說明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如果越善於利用網路來加強與受眾互動、擴大社交或推廣自己的報導，那麼其對整體工作自主性的評價就越高。互聯網使用技能的「獲取資訊」因數較為顯著地正向預測了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整體工作自主性、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預測係數分別為 $\beta = .06^*$ ， $\beta = .08^{**}$ ， $\beta = .09^{**}$ 」。這說明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如果越善於利用搜尋引擎、網路資料庫、網路論壇或博客、社交網站、從業者聊天群來獲取新聞線索或背景資料，那麼其對整體工作自主性、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的評價就越高。互聯網使用技能的「網路翻牆」因數較為顯著地負向預測了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整體工作自主性、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預測係數分別為 $\beta = -.07^*$ ， $\beta = -.10^{***}$ ， $\beta = -.08^{**}$ 」。這說明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如果越善於利用網路翻牆技術來流覽境外資訊或在境外網站發佈報導資訊，那麼其對整體工作自主性、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的評價就越低。

誠然，互聯網使用技能對於大陸報業新聞人的生產實踐和 業自主來說是一把雙刃劍。技術對於媒介的影響不僅在於提高效能和生產率，更重要的是改變或加強了權力的特定形式，這正是蘭登·溫納（Langdon Winner）指出的技術的政治內涵（Langdon, 1986），這種政治內涵通常表現為集權主義和解放自由兩種潛能（Lewis, 1964）。一方面，互聯網的技術力量促進了資訊的自由流動，開闢了一定的社會公共領域，進而給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新聞理想和專業自覺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發酵的空間；另一方面，網路的「自淨化」功能帶來了意見的碎片化和極化現象，網路技術又不期然增強了話語霸權和資訊監管

功能。於是，人們寄予新媒體技術所帶來的民主、自由和改革的希冀或將在技術話語霸權的強勢監管下被消解成一地雞毛。誠如本項研究所示，儘管新媒體技術給予了新聞從業者參與自主實踐的多種可能，然在具體的新聞生產情境中，由「資訊技術的賦權」帶來的創新突破語境或將被由「民主參與的幻象」帶來的霸權監管語境所消解，現實情境中這兩種語境往往交織疊加在一起，因時因事而此消彼長，互為支持或互為掣肘，共同對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空間實施着累加或突變的影響。

綜上所述，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受到了來自個體特徵層面不同變數之間的能動的多維影響。在實際的新聞生產場景中，這些影響因素往往滲透交錯，綿密交織在一起，它們共同型塑了新聞從業者的工作生態和報導常規，並內生性地、漸進性地推動和影響着新聞從業者的新聞生產策略和工作自主情狀。

圖一 中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影響因素網狀結構圖



結論與建議

既往的新聞從業者研究沒有對「行動者」的個體特徵變數給予足夠的關注，這種方法論的缺失間接導致了新聞從業者研究領域中理論的貧困和經驗的貧乏。目前關於新媒體技術與新聞從業者的交叉研究主要集中在新聞從業者對互聯網的採納和使用方面(周裕瓊，2004)，可以說，國際學術界對於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從業者的個體特徵變數與其工作自主性之間相關關係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本文通過實證研究增進了我們對新媒體環境下個體特徵變數是否以及如何影響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的多維理解。通過定量的統計方法，本文較為系統地分析了中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調查資料，研究發現，當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性的滿意程度略有下降。在控制人口變數的基礎上，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個體特徵變數中的媒介角色認知與互聯網使用技能均顯著地預測了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在實際的新聞生產情境中，來自從業者個體特徵層面的不同影響因素滲透交錯，綿密交織在一起，它們共同型塑了新聞從業者的工作生態和報導常規。此外，研究還揭示，在互聯網時代，新媒體技術已然成為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生產實踐的結構性力量和變革性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技術使用者隱性抗爭和顯性突破的自主潛能。同時，本研究也進一步豐富和提升了媒介社會學的經驗基礎和理論內涵。

本研究將新媒體環境引入到結構分析框架中能夠幫助我們更加充分地理解大陸報業新聞人在面對政經結構的鉗制和互聯網技術的衝擊下所面臨的兩難困境。本項研究得出的一個貌似矛盾的結論是：在新媒體語境下，一方面，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性的整體評價略有下降；另一方面，當大陸報業新聞人越傾向於去「監督和影響」、「服務與娛樂」或「提供資訊」時，其對工作自主性的評價就越高。若把這兩個研究發現疊加在一起似乎就隱含了邏輯上的一個因果悖論。既然當下的新媒體語境能夠給大陸報業新聞人提供更多的新聞線索和傳輸管道，開闢出更多的互動和推廣平台，有利於報人更好地去踐行「監督和影響」、「服務與娛樂」及「提供資訊」的社會角色與功能，那麼為何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性的整體評價反而有所下降呢？

本研究分析悖論出現的主要原因在於：其一，當下大陸當局強化了對傳媒意識形態的管控，為打贏意識形態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最高領導層多次提出要爭奪話語權和主動權，掌握輿論制高點。誠如習近平總書記在8·19講話中所述，「我們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人民日報》，2013：1)。繼此之後，各大報業媒體紛紛表達了捍衛主流意識形態的決心。於是，在高度統一報導口徑的宣傳管制下，大陸報業內部自我審查嚴重。尤其「在爭議性事件中，等政府定性之後，依據官方通報或中央媒體進行報導，是大陸媒體避免口徑失誤的常規做法(routine)。抱着「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信條，大多數媒體僅能在標題和導語上發揮有限的自主性」(周裕瓊、齊發鵬，2014：63)。與此同時，大陸國新辦、工信部和公安部三大互聯網監管機構進一步強化了對網路資訊內容的監管力度，國家強勢介入互聯網治理客觀上導致了新媒體技術開關的个体自主空間被大大壓縮。「理想總是豐滿的，而現實卻是骨感的」，橫互在大陸報業新聞人面前的依然是一條新聞專業主義理想和黨國意識形態控制之間的溝渠。其二，基於樣本介紹我們可以得知，目前絕大多數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擁有大專或大專以上學歷，15.4%的擁有碩士、博士學位。由此可見，大陸報業新聞人的受教育程度頗高，眾所周知，個體的受教育程度與其新媒體使用技能高度正相關。故此本研究推斷，普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大陸報業新聞人能夠熟練地掌握新媒體技術，能夠自如地流覽國外網站以及在國外網站張貼、推廣自己的報導。但是，由於傳統威權國家和現代化民主國家的媒介體制截然不同，新聞自由亦有不同呈現，故比較視野下容易滋生大陸報業新聞人的悲觀消極心態，這種心態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陸報業新聞人對工作自主性的整體評價。誠如大陸學者所言，在方便了表達的同時，互聯網也方便了監控，因此它無法振興民主，更不能阻止大家對政治的冷漠(胡翼青，2014)。以上兩點大致可以解釋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性的整體評價有所下降的原因。

最後，本項研究並非沒有局限。首先，抽樣方式限制了本文描述性發現的推廣範圍。由於資源的限制，本研究的調查樣本未能做到全

覆蓋。由於本次調查主要採取的是非隨機抽樣的方法，故抽取的樣本難免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如果能夠獲取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全樣本資料，那麼研究結論就會具有更強的經驗基礎和預測能力。其次，在變數的選取和指標的設計方面依然還存在可以改進的空間。比如在被解釋變數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測量體系的架構上，國內外學者的關注視野和研究旨趣就有所不同。國外研究者比較關注新聞從業者在採制過程中的自主性表現，故而喜歡從新聞題材和報導重點等生產常規角度來建構量表切入研究(Tunstall, 1971; Weaver & Wilhoit, 1986, 1996)；港台研究者更加注重採訪和發稿環節的自主程度，故習慣從採訪自主權和發稿自主權等報導常規角度來建立測量指標(華英惠, 1992)；大陸研究者則傾向於採取過程導向的視角，關注整個產制流程中新聞從業者自主性的不同表現，故而習慣從確定選題、採制過程、發稿這三個維度建構量表來進行研究(陸曄, 2004)。為了確保測量體系的完整性和邏輯轉換的一致性，本項研究依然沿用了國外學者現有的測量指標體系來建構工作自主性量表(Weaver & Wilhoit, 1986, 1996)，當然，未來研究還有待尋求更加本土化和精確化的測量指標和體系。此外，在對解釋變數(個體特徵變數)的選取上，建議今後的研究還可以增加新聞從業者的人際關係/社會資本(強關係/弱關係)這個測量維度。因為在人際關係上，既有研究發現，在正式的組織中，地位愈高、與編輯互動愈頻繁的記者，擁有越大的自主權(Tunstall, 1971)。一般說來，人際關係包括在現實社交中構建的真實人際關係和在網路互動中構建的虛擬人際關係，而在社交媒體被新聞從業者廣泛運用的今天，這些人際關係往往是線上線下頻密互動並同步相連的，它們共同塑構了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從業者人際交往中各種社會資本的強弱聯接。故此，本研究認為，通過線上線下互動建構的人際關係/社會資本或將成為新媒體環境預測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的下一個關鍵指標。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人民日報》(2013年8月21日)。
〈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8·19重要講話精神〉，第1版。
- The People's Daily (2013, August 21). Xuexi guanche Xi Jinping zong shuji 8.19 zhongyao jianghua jingshen. A1.
- 卜衛、劉曉紅(1998)。
〈新聞記者的網路使用《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國日報》記者使用電腦和互聯網的報告〉。
《新聞與傳播研究》，第3期，頁34-46。
- Bu Wei, Liu Xiaohong (1998). Xinwen jizhe de wanglu shiyong *Renmin Daily*, Xinhua she, *China Daily*, jizhe shiyong diannao he hulianwang de baogao.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3, 34-46.
- 伯納·羅胥克(1994)。
《製作新聞》(姜雪影譯)。台北：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Bernard, R. (1994). *Zhizuo xinwen* (Jiang Xueying Trans.). Taipei: Taipei yuanliu chuban shiye gufen youxian gongsi.
- 吳予敏(2007)。
《傳播與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Wu Yumin (2007). *Chuanbo yu wenhua yanjiu*.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吳飛(2005)。
〈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滿意度〉。
《新聞與傳播研究》，第3期，頁49-56。
- Wu Fei (2005). Xinwen congye renyuan de zhiye manyidu. *Xinwen chuanbo yanjiu*, 3, 49-56.
- 吳飛、白林(2006)。
〈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滿意度分析〉。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1期，頁137-143。
- Wu Fei, Bai Lin (2006). Xinwen congye renyuan de zhiye manyidu fenxi. *Zhongguo renmin daxue xuebao*, 1, 137-143.
- 李強(2015年1月5日)。
〈互聯網正在重塑中國文化習慣〉。
《北京日報》，第20版。
- Li Qiang (2015, January 5). Hulianwang zhengzai chongsu Zhongguo wenhua xiguan. *Beijing Daily*, A20.
- 周裕瓊(2004)。
〈主動採納與被動採納——互聯網在中國新聞從業者中的擴散〉。
《新聞與傳播評論》博士生論壇輯刊，頁201-212。
- Zhou Yuqiong (2004). Zhudong caina yu beidong caina—hulianwang zai Zhongguo congyezhe zhong de kuosan. *Xinwen yu chuanbo pinglun* (boshisheng luntan jikan), 201-212.

- 周裕瓊 (2008)。〈互聯網使用對中國記者媒介角色認知的影響〉。《新聞大學》，第1期，頁90-96。
- Zhou Yuqiong (2008). Hulianwang shiyong dui Zhongguo jizhe meijie juese renzhi de yingxiang. *Xinwen daxue*, 1, 90-96.
- 周裕瓊、齊發鵬 (2014)。〈策略性框架與框架化機制：烏坎事件中抗爭性話語的建構與傳播〉。《新聞與傳播研究》，第8期，頁46-69。
- Zhou Yuqiong, Qi Fapeng (2014). Celuexing Kuangjia yu kuangjiahua jizhi: Wukan shijian zhong kangzhengxing huayu de jiangou yu chuanbo.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8, 46-69.
- 周翼虎 (2009)。〈抗爭與入籠：中國新聞業的市場化悖論〉。《新聞學研究》，第100期，頁101-136。
- Zhou Yihu (2009). Kangzheng yu rulong: Zhongguo xinwenye de shichanghua beilun. *Xinwenxue yanjiu*, 100, 101-136.
- 林文剛 (2007)。《媒介環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Lin Wengang (2007). *Meijie huanjingxue—sixiang yan'ge yu duowei shiye*.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阿德勒 (2010)。《心理與生活》(葉頌姿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 Adler, A. (2010). *Xinli yu shenghuo* (Ye Songzi et al.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chubanshe.
- 胡翼青 (2014年8月8日)。〈解構新媒體神話——評《互聯網的誤讀》〉。《光明日報》，第12版。
- Hu Yiqing (2014, August 8). Jiegou xinmeiti shenhua—ping *Hulianwang de wudu*. *Guangming Daily*, A12.
- 范皚皚、丁小浩 (2008)。〈教育、工作自主性與工作滿意度〉。《清華大學教育研究》，第6期，頁40-47。
- Fan Ai'ai, Ding Xiaohao (2008). Jiaoyu, gongzuo zizhuxing yu gongzuo manyidu. *Qinghua daxue jiaoyu yanjiu*, 6, 40-47.
- 馬亞寧 (2004)。〈美國新聞從業者專業角色觀念考察——從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新聞大學》，冬季號，頁26-29。
- Ma Yaning (2004). Meiguo xinwen congyezhe zhuan ye jue se guannian kaocha—cong 20 shiji 70 niandai zhi 90 niandai. *Xinwen daxue*, winter, 26-29.
- 張志安 (2008)。〈新聞生產與社會控制的張力呈現——對〈南方都市報〉深度報導的個案分析〉。《新聞與傳播評論》，第7期，頁165-173。
- Zhang Zhi'an (2008). Xinwen shengchan yu shehui kongzhi de zhangli

- chengxian — dui *Nanfang dushibao* shendu baodao de ge'an fenxi. *Xinwen yu chuanbo pinglun*, 7, 165–173.
- 張志安(2012)。〈互聯網如何影響我國新聞業〉。《傳媒》，第12期，頁57–59。
- Zhang Zhi'an (2012). Hulianwang ruhe yingxiang woguo xinwenye. *Chuanmei*, 12, 57–59.
- 張志安、吳濤(2014)。〈「宣傳者」與「監督者」的雙重式微——中國新聞從業者媒介角色認知、變遷及影響因素〉。《國際新聞界》，第6期，頁61–75。
- Zhang Zhi'an, Wu Tao (2014). “Xuanchuanzhe” yu “jianduzhe” de shuangchong shiwei — Zhongguo xinwen congyezhe meijie jue se renzhi, bianqian ji yingxiang yinsu. *Guoji xinwen jie*, 6, 61–75.
- 張志安、張京京、林功成(2014)。〈新媒體環境下中國新聞從業者調查〉。《當代傳播》，第3期，頁4–8。
- Zhang Zhi'an, Zhang Jingjing, Lin Gongcheng (2014). Xinmeiti huanjing xia Zhongguo xinwen congyezhe diaocha. *Dangdai chuanbo*, 3, 4–8.
- 張志安、陶建傑(2010年12月)。〈網路新聞從業者工作滿意度及影響因素研究〉。「傳播與中國·復旦論壇」論文，上海。
- Zhang Zhi'an, Tao Jianjie (2010 December). Wanglu xinwen congyezhe gongzuo manyidu ji yingxiang yinsu yanjiu. “*Chuanbo yu zhongguo, fudan luntan*” lunwen, Shanghai.
- 張志安、陶建傑(2011)。〈網路新聞從業者的自我審查研究〉。《新聞大學》，第3期，頁153–157。
- Zhang Zhi'an, Tao Jianjie (2011). Wanglu xinwen congyezhe de ziwo shencha yanjiu. *Xinwen daxue*, 3, 153–157.
- 張洪忠、何艷、許航(2007)。〈北京地區新聞從業者的職業選擇觀〉。《新聞與寫作》，第1期，頁32。
- Zhang Hongzhong, He Yan, Xu Hang (2007). Beijing diqu xinwen congyezhe de zhiye xuanzeguan. *Xinwen yu xiezuo*, 1, 32.
- 陸曄(2000)。〈上海廣播電視媒體從業人員調查分析報告〉。《新聞大學》，春季號，頁40–45。
- Lu Ye (2000). Shanghai guangbo dianshi meiti congye renyuan diaocha fenxi baogao. *Xinwen daxue, spring*, 40–45.
- 陸曄(2003)。〈新聞從業者的媒介角色認知——兼論輿論監督的記者主體作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第2期，頁86–91。
- Lu Ye (2003). Xinwen congyezhe de meijie jue se renzhi — jianlun yulun jian du de jizhe zhuti zuoyong. *Zhongguo qingnian zhengzhi xueyuan xuebao*, 2, 86–91.

- 陸曄(2004)。〈社會控制與自主性——新聞從業者工作滿意度與角色衝突分析〉。《現代傳播》，第6期，頁7-16。
- Lu Ye (2004). Shehui kongzhi yu zizhuxing — xinwen congyezhe gongzuo manyidu yu jueze chongtu fenxi. *Xiandai chuanbo*, 6, 7-16.
- 陸曄、俞衛東(2003)。〈傳媒人的職業理想——2002上海新聞從業者調查報告之二〉。《新聞記者》，第2期，頁8-11。
- Lu Ye, Yu Weidong (2003). Chuanmeiren de zhiye lixiang — 2002 Shanghai xinwen congyezhe diaocha baogao zhi er. *Xinwenjizhe*, 2, 8-11.
- 陸曄、俞衛東(2003)。〈傳媒人的媒介觀與倫理觀——2002上海新聞從業者調查報告之四〉。《新聞記者》，第4期，頁46-49。
- Lu Ye, Yu Weidong (2003). Chuanmeiren de meijieguan yu yulunguan — 2002 Shanghai xinwen congyezhe diaocha baogao zhi si. *Xinwen jizhe*, 4, 46-49.
- 陸曄、潘忠黨(2002)。〈成名的想像：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新聞學研究》，第71期，頁39-53。
- Lu Ye, Pan Zhongdang (2002). Chengming de xiangxiang: shehui zhuanxing guochengzhong xinwen congyezhe de zhuan ye zhuyi huayu jiangou. *Xinwenxue yanjiu*, 71, 39-53.
- 喻國明(1998)。〈角色認知與職業意識——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意識與職業道德抽樣調查報告(之一)〉。《青年記者》，第2期，頁4-7。
- Yu Guoming (1998). Juese renzhi yu zhiye yishi — Zhongguo xinwen gongzuozhe zhiye yishi yu zhiye daode chouyang diaocha baogao (zhi yi). *Qingnian jizhe*, 2, 4-7.
- 斯蒂文·伯恩斯坦、威廉·科爾曼(編)(2011)。《不確定的合法性——全球化時代的政治共同體、權力和權威》(丁關傑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Bernstein, S., & Coleman, W. D. (2011). *Bu queding de hefaxing—quanqiu hua shidai de zhengzhi gongtongti, quanli he quanwei* (Ding Guanjie et.al. Trans.).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華英惠(1992)。《台灣地區新聞從業員工工作滿意程度研究》。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Hua Yinghui (1992). *Taiwan diqu xinwen congye uangong gongzuo manyi chengdu yanjiu*. Taiwan guoli zhengzhi daxue xinwen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 劉兢(2010)。〈「當代中國傳媒改革」的海外視角——20世紀90年代以來海外學者「中國傳媒改革」研究綜述與思考〉。《新聞記者》，第7期，頁59-63。
- Liu Jing (2010). “Dangdai zhongguo chuanmei gaige” de haiwai shijiao — 20 shiji

90 niandai yilai haiwai xuezhe “Zhongguo chuanmei gaige” yanjiu zongshu yu sikao. *Xinwen jizhe*, 7, 59–63.

潘忠黨、李良榮、趙月枝、孫旭培、吳飛、魏永征、單波、黃旦、徐賁、李霞、陳衛星(2008)。〈反思與展望：中國傳媒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筆談〉。《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期，頁17–48。

Pan Zhongdang, Li Liangrong, Zhao Yuezhi, Sun Xupei, Wu Fei, Wei Yongzheng, Shan bo, Huang Dan, Xu Ben, Li Xia, Chen Weixing (2008). Fansi yu zhanwang: Zhongguo chuanmei gaige kaifang sanshi zhounian bitan.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6, 17–48.

羅文輝、陳韜文等(2004)。《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台北：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Luo Wenhui, Chen Taowen deng (2004). *Bianqian zhong de dalu, Xianggang, Taiwan xinwen renyuan*. Taipei: Taipei Juliu tushu gongsi.

羅以澄、候迎忠(2006)。〈新聞記者的角色衝突和道德失範——兼論記者的職業責任和社會責任〉。《武漢大學學報》，第3期，頁235–239。

Luo Yicheng, Hou Yingzhong (2006). Xinwen jizhe de juese chongtu he daode shifan — jianlun jizhe de zhiye zeren he shehui zeren. *Wuhan daxue xuebao*, 3, 235–239.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Auh, T. S., Lee, C. K., & Kang, M. K. (1998). Korean journalists in the 1990s. In D. Weaver (Ed.),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pp. 55–69).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Beate, J., & Ian, R. (2012). The Australian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 In D. Weaver (Ed.), *The global journalists in the 21st century* (pp. 115–125).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Bowers, D. R. (1967). A report on activity by publishers in directing newsroom decisions. *Journalism Quarterly*, 44(1), 43–52.

Chan, J. M., Lee, P. S. N., & Lee, C. C. (1996).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an, J. M., Lee, P. S. N., & Lee, C. C. (1998). East meets west: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 In D. Weaver (Ed.),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pp. 31–53).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Chan, J. M., & Lee, F. L. F. (2007). Media and politics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An introductio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127–133.

Chen, C., Zhu, J. H., & Wu, W. (1998). The Chinese journalist. In D. Weaver (Ed.),

-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pp. 9–30).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Cohen, B. C. (1963).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ulbertson, H. M. (1983). Three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journalism. *Journalism Monographs*, 83, 25–58.
- Ezhar, T., Sony, J. R., & Manimaran, G. (2012). Malaysian journalists. In D. Weaver (Ed.), *The global journalists in the 21st century* (pp. 78–90).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 Freidson, E. (1994). *Professionalism reborn: Theory, prophecy and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ans, H. J. (1979). *Deciding what i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aye, T. (1973). 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 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1), 110–131.
- Hackman, J. R., Oldham, G. R. (1976). Motivation through the design of work: Test of a theor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6(2), 250–279.
- Heinonen, A. (1998). The Finnish journalist: Watchdog with a conscience. In D. Weaver (Ed.),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pp. 161–190).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Herscovitz, H. G., & Cardoso, A. M. (1998). The Brazilian journalist. In D. Weaver (Ed.),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pp. 257–276).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Johnstone, J. W. C., Slawski, E. J., & Bowman, W. W. (1976). *The news people: A sociological portrait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and their work*.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Kirat, M. (1998). Algerian journalists and their world. In D. Weaver (Ed.),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pp. 323–348).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Kim, Sung, T., (2008). *Interne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eoul, Korea: Nanam Press.
- Kovats, I. (1998). Hungarian journalists. In D. Weaver (Ed.),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pp. 257–276).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Langdon, W. (1986).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e, C. C. (2005). The concep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ts: Ideological convergence and contestation. In H. de Burgh (Ed.), *Making journalists* (pp. 107–126). London: Routledge.
- Lee, C. C., & Kyun, K. (2006).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mong Korean journalists. *Korean Journa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50(6), 59–88, 490.

- Lewis, M. T. (1964),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5(1), 1–8.
- Lo, V. H. (1998). The new Taiwan journalist: A sociological profile. In D. Weaver (Ed.),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pp. 71–88).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Lucinda, D., Frederick, F., David, W. (1996). Computers in newsrooms of Michigan newspapers.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3–4, Summer/Fall.
- Maneul, C. (2007).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counter-power in network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238–266.
- McChesney, R. W.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2, 109–116.
- McMane, A. A. (1998). The French journalists. In D. Weaver (Ed.),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pp. 191–212).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McQuail, D. (1992). *Media performanc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ondon: Sage.
- Rihoux, B., & Charles, C. R. (Eds.). (2009). *Configurational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related techniques*. Thousand Oaks: sage.
- Sigelman, L. (1973). Reporting the new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132–151.
- Thomas, H., & Dedy, N. H. (2012). Journalists in Indonesia. In D. Weaver (Ed.), *The global journalists in the 21st century* (pp. 36–51).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 Tuchman, G. (2002). The production of news. In K. B. Jenson (Ed.), *A handbook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ologies* (pp. 81–86). London: Routledge.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Tunstall, J. (1971). *Journalists at work*. London: Constable Press.
- Weaver, D. H., & Willnat, L. (2012). Introduction. In D. Weaver (Ed.), *The global journalists in the 21st century* (pp. 1–5).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 Weaver, D. H., & Wilhoit, G. C. (198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 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 Bloomington, IA: Th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Weaver, D. H. (1991).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 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 Bloomington, IA: Th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Weaver, D. H., & Wilhoit, G. C. (199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1990s: U. S. news people at the end of an era*.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Weaver, D. H., Beam, R. A., Brownlee, B. J., Voakes, P. S., & Wilhoit, G. C. (2009).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 U. S. news people at the dawn of a new millennium*. New York: Routledge.

- Zhang, H., & Su, L. (2012). Chinese media and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 In D. Weaver (Ed.), *The global journalists in the 21st century* (pp. 9–21).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 Zhu, J. H., Weaver, D., Lo, V., et al. (1997).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societal influences on media role percep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ournalists in China,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 85.

本文引用格式

- 曾麗紅、吳雁 (2015)。〈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的影響因素研究——基於個體特徵變數的考察〉。《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34 期，頁 19–55。